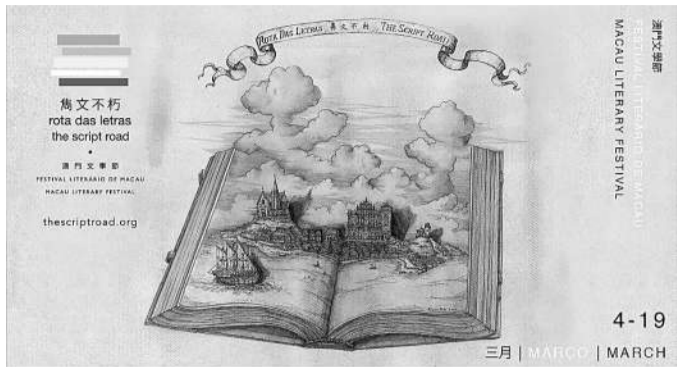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艺评论

ARTS AND CULTURE



自2012年起,低调起家的“粤文不朽澳门文学节”便为这座南海北岸的小城带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文人相聚。一反香港书展的“蜂拥入场”及图书热卖,澳门文学节显得安闲而又自在。

文学节的据点定在南湾大马路上的旧法院大楼,斜对着澳门唯一一间百货公司八佰伴,虽处在闹市区,却显得格外宁静。这栋大楼平时就用来做展览和戏剧演出,所以民众经过时,若非事先了解,大抵也不好奇一群在这里走出入的人都在忙些什么。

在这栋大楼里,活动现场没有围栏,活动参与度属小众,作家们根本没有“偶像包袱”。任何一位有心的文学爱好者,无须入场证,都能走进现场,与自己喜爱的作家拉近距离,索取签名或拍个合照,甚至还能有机会与作家同桌进餐。

最有趣的是,这个基于澳门的文学节,发起者竟是一家本土的葡萄牙语日报Ponto Final(句号报)。这一群活跃在澳门葡萄牙社区的人,六年里,竟已“悄无声息”地邀请了超过100位来自两岸四地的、葡萄牙语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工作者。

历年出席过的华人作家有北岛、苏童、余光中、虹影、严歌苓、毕飞宇、韩少功、王安忆、郑渊洁、刘心武、骆以军、席慕蓉、颜歌、陈冠中、王刚、邱华栋、西川、欧阳江河等。

而葡语作家那边,历年的重磅嘉宾有最畅销作家José Luís Peixoto(作品已经翻译成不低于20种语言),葡萄牙获奖记者、畅销

作家José Rodrigues dos Santos,葡语系文学界中最具声誉的PT文学奖获得者Valter Hugo Mãe,及兼获2010年巴西文学最高奖项“雅布提奖”和2013年“萨拉马戈文学奖”的翁贾基(Ondjaki)等。

主办方尽可能地把活动办得“内容丰富,衔接自然”,把每场活动的时间控制在1小时左右,甚至会分场地同时进行两场活动。在2012、2013年时还是文学周,之后文学节的规模、内容逐年增加。到了今年,嘉宾已达50多位,文学活动有逾百场,其中最密集的一天里,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,在8个不同的场地,进行了10场活动。

这一届文学节的主菜单依旧还是作家们就

不了解,颇有点“自说自话”的味道。

但每年的这个文学盛会,却鲜少被当地的中文媒体报道,多场活动中,即使有华语知名作家,可几乎见不到澳门中文媒体对于他们的报道,更别提做作家的专访。

当地葡文媒体则不然,但在对于华人作家的报道上,倾向于已享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,如北岛、严歌苓、郑渊洁、慕容雪村、余华、西川等,作为主办方的 Ponto Final(句号报),在今年文学节期间,平均每天有4至5版都是活动报道及人物专访。

不过,“公众参与度”这个词却略显有点难堪。据本地葡语报纸Plataforma(澳门平台)报道,文学节活动的副总监Helder Beja解



澳门文学节：一件闲适的小城“大”事

◎叶子

写作、文化、政治、国际议题(如难民、核问题)等进行的对谈、讲座以及个人的写作工作坊。此外,还配有诗歌即兴表演、电影放映、剧场表演、新书发布、展览、音乐会等。

今年,作为例牌的“文学节走入校园”系列活动,继续为当地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带来不少福利——华人作家程永新、秦文君、余华、张悦然等走入校园,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成长。

同时,每年必办的两场音乐会(中文一场,葡文一场),邀请的也是一些偏文艺的歌手,2016年邀请了葡萄牙Fado女王Christino Branco,2017年邀请了葡萄牙过去40年里最伟大的音乐创作人的Segio Godinho。然后中文这边,除了2013年王若琳,其他都是一些小众乐团,如万能青年旅店、尧十三。虽然音乐会的门票一早就在网上发售,但售票情况一直不温不火,很多票都是送出去的。

虽说中文和葡萄牙语是澳门的两大官方语言,可是不同国家的作家聚在一起,沟通语言仍是英语,且主场地配置的也只有中英同声传译。而介绍文学节的场刊及音乐会的字幕,都是中、英、葡三语。

与此同时,主办方在安排中葡作家融合交流上煞费苦心。中文和葡萄牙语的文学本就沟通甚少,若中文作家作品未翻译成英文,那么葡萄牙人是绝对不会知道这位作家的存在,反之亦然。中文和葡文作家对谈,避免不了“中文作家说中文,葡文作家说葡文”,若对彼此的作品

释称2016年文学节吸引了1万多名旅客,这显然是过度夸大。若你走进旧法院大楼,随意地挑选一场活动,现场大约七八十个座位,常常坐不够一半人,其中还不乏文学节的铁粉。

然而,对于作家们来说,这却有了一种自由和舒适。中国作家在内地办个讲座,现场会塞得水泄不通,在澳门却得了片刻清闲。旧法院门口,你常常会看到作家们或坐在阶梯上,或站着,抽烟、聊天,或三两人,或五六人,不时有葡萄牙人进出,和门口的每个人打招呼,然后走进,就像串了个门。内设一个咖啡馆,诗人朗诵会就在这里。里面的几个屋子里,墙上挂满了画作,或荒诞(漫画),或沉思(摄影作品)。

在晚上,主办方安排有音乐会、戏剧、电影放映,作家们可以观看。除此之外,还有配着红酒的诗歌即兴表演,人和人自由地组合在一起,碰杯、聊天,一聊high了,就彻夜不回。这时,谁都是“无我”。

这群葡萄牙人组织起来的澳门文学节,实在有点无规可循,他们看起来组织得一团混乱,但却给予了作家们自由,自由地留下继续酣畅地聊天,或自由地离开去澳门的老城区走走。

第一次来到澳门文学节的嘉宾,总不忘的是美味的餐厅——外国的作家们找寻本土的餐厅,华人作家们找寻葡萄牙餐厅——及带回家的“手信”——杏仁饼、肉干、茶等。

如此想想,在澳门的几天生活,甚是自在。
供图/Eduardo Martins 澳门文学节



《涅槃经变菩萨头饰》2012-2013年

2017年3月8日下午,“花开敦煌——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”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据参加开幕的同学说,在人群外跳起来好几次都没有能看到常奶奶本尊。按照清华美院官微的说法,有700多人参加画展开幕。看后脑勺的同学也没白去,那里的每个后脑勺都代表中国当今美术界的一座山峰。

常院长1931年3月生于法国里昂,名字来自当地的一条河流“la saone”,中文译名“沙娜”,人们尊称“常先生”,我们叫她“常奶奶”。常奶奶承继父志,一生致力保护和研究敦煌,敦煌成为常奶奶艺术生涯里的信仰。我的报社同事看展览回来感叹道,“虽然人生而平等,但人生的价值确实大不同。每次看到她们,都忍不住要掉眼泪。多么伟大,没有辜负生命”。常奶奶14岁临摹《文殊变》;2017年初,她历时两个月再次画下《文殊变》,时年86岁。是不是有这份坚守才让人变得伟大,或者伟大的人天生来就具备坚守的品格,而我们的泪腺是被这种精神击中!

此次展览分为守望、凝萃、传承三个主题,有壁画临摹、花卉写生、艺术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。常奶奶给我们上过三次课,分别是敦煌色彩、壁画临摹和花卉写生。看到这些作品就像见老朋友一样,非常亲切。

常奶奶一生桃李满天下。20年前,给我们授课的时候她66岁,那时的她风华正茂,精力充沛。常奶奶不爱坐电梯,下课后要从十三楼走到二层办公室,身轻如燕,年轻人跟不上。常奶奶对待教学从来一丝不苟,临摹敦煌图



《文殊变》1945年

常院长是我们的「常奶奶」

◎小园



《观音头饰》2012-2013年

案时必须跟范本一样。调颜色最痛苦,由于颜色干湿有色差,要先涂几块颜色等干了以后和范本比对,敦煌色彩明暗中包含着一种高级灰,调和出来非常困难。有时好不容易都满意了,画到最后颜料不够了,只好拓稿从头再来。作业繁重需要熬夜,白天难免会困,有一次常奶奶轻轻摇晃正熟睡的同学,我们都为这位同学捏一把汗,只听常奶奶俯身说“再睡会更胖的”,气氛一下活跃起来。20年过去了,这个梗成了与常奶奶相处中最温情的回忆。

常奶奶多数时候是严肃的,因为她的思索总是与时代的大命题联系在一起。她的身份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院人,她设计与人民大会堂、香港紫荆广场关联。但在课堂上常先生不是“院长”而是“奶奶”。在课堂上分月饼给我们吃,用好听的口音讲敦煌的故事。讲王圆箴的时候更多的是同情,对大英博物馆在她借用敦煌资料时设置障碍的事上更多的是包容。“敦”是“大”的意思,常奶奶具有敦煌一样的大气象。

常奶奶在《黄沙与蓝天》中写道,“我有一个习惯,不论在国内国外,南方北方,闲暇散步时,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,寻找‘幸运草’……应该说,我确实是幸运的。”她说在人生的边上,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在她14岁到86岁的艺术生涯,在15年的院长任内,在退休后的20年里,常奶奶做了很多的事,也一定有很多未竟的事业。她觉得她是幸运的,遇上好的时代。其实,时代何尝不幸运,遇见沙娜,花正盛开。

当中国建盏成了日本国宝

◎九孔鲍

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,各地窑口争奇斗艳,精品迭出。除了名闻天下的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五大名窑之外,老窑口南方越窑、北方磁州窑、邢窑雄风犹存,浙江龙泉窑、陕西耀州窑开始大放异彩,后起之秀景德镇也已崭露头角。当时,瓷器以单色釉为主,青釉、白釉瓷平分秋色,然而,在偏僻的南方福建建阳,一向不为世人所重的黑釉建盏,却因茶而兴,异军突起。

建阳窑,始烧于晚唐五代,盛于两宋,窑址位于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。建窑瓷胎土多以含铁质较多的红、黄壤土粉碎加工,含砂明显,胎体厚重,含铁量高,烧成后胎体呈黑、灰黑、黑褐色,向有“铁胎”之称。建窑瓷以日用器为主,尤以品茗的茶碗即建盏最为知名。

建盏最大特点是釉中铁结晶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窑变斑纹,最受推崇的纹饰有三类:一为兔毫纹,斑纹呈条状,有黄、白两色,故又有金、银兔毫、玉毫、兔斑等别称,传世建盏多属此类;二为油滴纹,釉面呈油滴形结晶;三为“曜变”纹(日语,意为光彩夺目的窑变),在不规整的油滴周围出现窑变蓝色。后两种传世品数量稀少,尤为珍贵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金元时期的黑釉碗、盏、盘,多为兔毫纹,油滴纹仅数件而已。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建窑黑釉茶盏精品,也多为兔毫盏,油滴盏屈指可数。

唐代,饮茶已风靡士庶,并臻于成熟。其标志之一,便是讲求汤色与茶器的完美配合。唐代流行煮茶法,即将饼茶碾成细末入水烹煮,再加盐等调料,故茶汤色丰富多彩。但自晚唐五代开始,煮茶法渐趋式微,点茶法逐渐流行。宋朝瓷业繁盛,五大名窑均有大量茶碗生产,龙泉窑和耀州窑也有非常精美的茶碗上市,景德镇烧造的影青瓷,胎薄釉白,呈半透明状。但这些茶碗当时并不受欢迎,原因就在于,宋代点茶茶汤颜色尚白,青瓷、白瓷、影青瓷都无法映衬汤色之美,唯有深色瓷碗方能实现。于是,色尚深黑的建窑茶盏悄然登堂入室,成为茶器的主角。

建盏脱颖而出,大行其道,固然与宋代宫廷、士大夫阶层点茶文化的兴起和斗茶的风行密切相关,但两个关键人物的居间推介与推重至关重要,那就是蔡襄和宋徽宗。

北宋初期,宋太宗即在福建建州北苑建立贡茶园,福建转运使丁谓专门制作八饼一斤的大龙凤团茶,供奉内廷,北苑贡茶开始声名鹊起。宋仁宗庆历六年,著名书法家蔡襄任福建转运使,亲自监制北苑贡茶,他改进工艺流程,选料更为严苛,制作出更加精细的小龙凤团茶,合二十饼为一斤,因品质超卓,引发朝野茶客疯狂追捧。蔡襄在《茶录》中详细记载了“点茶”和“斗茶”的工艺特点,茶器蔡襄推崇建盏,《茶录》“茶盏”条称:“茶色白,宜黑盏。”

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丹青圣手,还是品茶高手,闲暇时还为群臣碾茶、点茶、分茶,其所著《大观茶论》是对北宋品茶文化的系统总结,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划时代的著作。在论“盏”时明确表示,选用黑釉盏是因能与茶色相互映衬对比。

热爱建盏的不仅是宋人,日本人对建盏的热爱也不遑多让,甚至超过了宋人。

日本仰慕、学习中华文化,继承了宋人酷爱饮茶这种风雅之事。宋代茶盏和点茶法,也东渡日本,风靡日本四岛,被日本人广泛接受,并发展成今日的“茶道”。建盏和其他黑釉茶盏,最早大多由日本留学僧人携带回国。在日本古文献中,建盏与其他中国黑釉盏有明确区分。因留学僧人多在临安城外天目山上的寺院中学习,对于不明产地的黑釉茶盏,在日本便有了一个笼统的名称——天目盏。

朴拙沉静的建盏,是茶道的当然主角,令日本茶人痴迷。明代以后由于中国建窑停烧,存世建盏皆为绝品,成为神圣的国宝级宝物。目前被日本定为“国宝”的陶瓷只有十四件,其中八件来自于中国,八件中则有三件是“曜变天目”。三件曜变天目,一件藏静嘉堂文库,一件藏大阪藤田美术馆,还有一件收藏于京都大德寺龙光院。此外,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南宋建窑黑釉盏,被认定为“重要文化财”;九州国立博物馆藏南宋建窑黑釉油滴天目盏,被认定为“重要文化财”;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南宋建窑黑釉油滴盏,被认定为“国宝”。

